

從經濟調控看台灣學術出版的困境與未來

陳建安¹

摘要

台灣出版產業整體產值下降，促使許多出版社跨足圖書銷售通路經營。對於單純僅倚賴圖書市場的專業或學術出版社而言，其營收卻受台灣出版整體環境不佳影響較大。政策干預對經濟產業是一種動態的調整與過程，一方面當市場體制不斷成熟，政府政策可退出這領域，但並不意味市場經濟的發展就會取消政府干預的要求。從圖書需求與圖書價格而言，專業學術類書種的市場需求彈性小，加上產品特殊與知識內容門檻較高，導致該類圖書價格彈性低，市場競爭力小。但，學術類圖書的外部性極高，容易產生更多書本本身以外的效益。所以，當市場機能無法解決時，該如何透過政策干預對產業有正向影響，是相當重要的。

關鍵字：出版經濟、政策、學術出版、經濟調控

¹ 陳建安，福建省閩南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台籍講師，曾擔任過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與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系兼任講師，也擔任過台灣兩岸華文圖書出版品及物流協會第二屆理事長。



一、現狀：台灣學術出版

出版經濟學是運用經濟學理論和方法對社會出版活動進行分析和研究的科學，而此理論的體系主要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微觀分析**，主要研究個別出版者、個別出版物與消費者的經濟行為，以及這些個別出版者、出版物和消費者怎樣相互作用，形成更大的經濟單位、市場和行業；並通過上述分析個別出版者、出版物與消費者的行為及相互作用，推論出版行業和出版市場的運行機制及方法。二是**宏觀分析**，主要研究出版經濟總量平衡和出版經濟穩定增長等問題，例如：出版經濟供求總量和結構均衡，出版經濟短期波動和長期增長等；簡言之，就是圖書需求與價格與收入間的關係。三是**出版經濟政策的研究**，包括如何利用稅收、補貼等經濟手段調控出版者的經濟行為，制定出版產業長期發展政策，促進出版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等ⁱ。

除了上述理論與方法外，出版經濟學更是一門應用性理論學科，在研究出版經濟學就必須對出版經濟活動中存在的各種現象加以觀察描述，並收集各種出版經濟資訊資料和資料；再者，對搜集的各種出版經濟現象、資料分析歸納，進一步探討各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從觀察描述進而歸納分析，以準確把握出版經濟的實質。但，這種比較科學的研究方式，對台灣地區出版產業而言，從根本上似乎沒有被傳統出版人所接受，因為許多台灣從事圖書出版的經營者，往往自詡為出版人，而非出版業，認為出版是種文化，並非商業，而他們有下列的心態：

「出版人，不是下結論的人，而是讓人有可下結論的人。出版人的使命，不是讓那一種知識，那一種意見，那一種立場得到彰顯，而是讓每一種知識、每一種意見，每一種立場都得到發展的細縫，從而照亮彼此的得失。」

這種出版人心態，也同樣反映在台灣的學術研究成果上。從資料上發現，台灣地區在出版相關論述上，研究領域偏向政策性的文章或論文，似乎也比較少。從台灣華藝線上圖書館ⁱⁱ以「出版政策」或者「出版經濟」的關鍵字進行查詢發現，就出版政策而言，學術期刊文章僅有 5 篇，且偏向過去出版的歷史或者著作權的管理；在博碩士論文部分，也同樣僅 6 篇，主要偏重歷史研究、消費行為與電子書相關政策；在出版經濟部分，學術期刊文章有 64 篇，包含政府管理與創意出版、台灣出版紀事、數字出版管理、政府出版品與歷史相關等主題；在博碩

ⁱ吳贊.出版經濟學的核心[M].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4.

ⁱⁱ 華藝線上圖書館(www.airitilibrary.com)是台灣地區搜錄學術性電子期刊、博碩士論文與電子書較權威的線上平臺。



士論文部分，有 20 篇，主要包括獨立書店、教科書研究、智慧財產學與圖書館等相關議題。從上述心態與資料，我們不難發現，台灣地區對於出版產業的發展與研究，可歸納成啞鈴式的研究方法，就是僅顧及左右兩端研究，就是個人(微觀)與大環境(宏觀)，而中間(出版經濟政策)，關於出版政策的研究似乎少有關注。

圖書出版，本身具備文化選擇、文化生產、文化傳播與文化積累的四項重要的社會功能。文化選擇，通過出版活動中的編輯工作來履行的，不論是對出版物的選題，還是對某一部作品進行的具體編輯加工，都是一種去劣存優的文化選擇過程；文化生產，就是一種文化承載物的生產，它是作者文化創造的繼續，編輯對著作（書稿）的選擇、整理、審讀、加工等都是一種文化創造活動；文化傳播功能，是通過出版活動中批量生產及出版物的廣泛傳播過程來實現的，最後，文化積累功能，是通過出版物為舊文化的保存與新文化的增長創造條件來實現的。出版相較於其他產業，它被賦予更多的公共服務。所以，以傳播知識為目的，用文字或者符號紀錄於一定形式的材料上的著作物，有別於普通商品的特殊商品，是一種特殊的精神消費品，具有公共產品特性的圖書出版產業，更應受到地區政府政策的支援，對出版產業進行經濟調控。而這種政府政策支持出版產業的情形，在國際上比比皆是，例如：日本與法國都以政府擔保方式支援中小型出版社與獨立書店、英國與德國也利用稅收鼓勵出版業，以及美國透過大量基金會的基金補助出版產業等ⁱⁱⁱ。

但，一項政策的制定，絕非在有問題之後，就會立刻產生政策規劃、合法化而後進行執行。政策，受到政府本身態度、政治或社會菁英、政黨或利益團體，以及媒體或民意取向等因素的影響。誠如先前由曾在台灣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邱炯友教授所領軍的「台灣地區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計畫，從接受台灣文化部委託執行，到 2016 年完成計畫報告後，不論在計畫執行過程或者結束後，執行團隊曾數度被告知，台灣“文化部”將會落實且執行圖書定價制度，但迄今時間經過了一年多，仍未見到有任何法規或者行政命令。這項政策可能已被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環境因素影響導致。

為何要提出出版經濟政策呢？因為台灣的出版產業已經遇到很大瓶頸，若以台灣近五年的出版產業的資料，更可以窺見一二。2016 年台灣地區的整體出版產業，包含圖書、漫畫及雜誌等，其營業額表現均呈現下滑，代表台灣整體出版市場，從 2012 年起至 2016 年五年以來，呈現持續趨緩態勢。以實體出版市場銷售數據來看，2016 年圖書（含漫畫）營業額為 192 億 9,209 萬元，較 2015 年衰退

ⁱⁱⁱ 楊貴山.國際出版業導論[M].大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6),P46-65



3.2%。^{iv}若根據台灣地區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所提供之 ISBN 申請資訊，2016 年總計當年度出版共計 40,401 種書籍，其中當年新書出版總（種）數及申請 ISBN 之出版社（單位）有止跌回升趨勢，與前一年度（2015 年）比較，申請 ISBN 出版機構多了 8 家（單位），出版新書總（種）數比 2015 年增加 1,594 種^v。但數字背後的真實是甚麼？雖然 2016 年圖書出版趨勢，在出版單位總數或新書出版量均呈現小幅回升，但進一步分析發現，2016 年申請 ISBN 的 4,987 家出版單位中，以僅出版 1 種圖書者為多數，為 2,823 家(占 57%)；其次為出版 2 至 5 種 1,232 家(占 25%)。換句話說，超過八成以上的出版單位，在 2016 年出版新書的數量，每家平均不超過 5 種。這種出版業態，似乎也是造成台灣出版整體產值下降原因之一。因為台灣沒有為數眾多的大出版社或者出版集團，無法形成規模經濟。每年平均出版不到 5 本的中小出版社，只是讓新書出版總量與新出版社數量增加，但產值沒有幫助。從國際出版業經驗來說，擁有大量中小出版社的區域，政策性的出版經濟調控似乎很重要，例如：法國由政府成立圖書出口中心協助中小出版社^{vi}。

台灣出版產業整體產值下降，促使許多出版社跨足圖書銷售通路經營。這結果雖然使出版社營收來源相對多元，但對於單純僅倚賴圖書市場的專業或學術出版社而言，其營收受台灣出版整體環境不佳影響較大。「專業出版社」，在台灣地區就是指民間學術出版社與大學出版社兩種。這兩種出版業態，在歐美各國，卻是政策重點扶持的出版行業，例如：英、美國家透過各種經費補貼、稅收等，大力扶植學術與專業出版社。反之，在台灣的专业或學術出版，不僅非政府政策關注重點，因出版社數量少、出版從業人員少、銷售通路屬於非主流的情況下，更是經營不善，無法生存。而台灣坊間偏重的圖書銷售排行榜與商業式行銷手法，讓台灣出版政策逐漸偏向大眾、實用書籍，而專業與學術只好備受委屈。

「台灣交通大學出版社執行編輯程惠芳表示，大學出版社存在的重要意義，在於將學校特色學門對外發聲，以及保存重要學術作品。歐、美等國大學出版社對學校而言都扮演重要角色，但台灣的大學出版社多只有 18 到 20 年歷史，相較其他地區相對年輕，資源投入、政府及學校的關注程度都還不足；此外，台灣各大學出版社無論在出版數量、組織規模等，與鄰近的大陸、日本都有很大差異。台灣的大學出版社若要繼續前進，除大

^{iv} 台灣經濟研究院.105 年台灣出版產業調查暨 106 年閱讀及消費趨勢分析[M].台灣：行政院文化部,2017.P3-20.

^v 台灣國家圖書館. 106 年台灣圖書出版現況及其趨勢分析[J].臺北：國家圖書館,2018.

^{vi} 同注 3.



學需要提高能見度，也需要政府部門更多支援。台灣地區的文化部現補助出版，多聚焦商業出版社及獨立出版，學界少受重視，教育部門也只有補助書展辦展。^{vii}」

人類之所以可此迅速從原始社會進入文明紀元，主要與學術傳播有極大關係。人類賴以發展的原因有三，第一，因為人類知曉利用符號與文字記錄過去發生的事情；第二，溝通傳播已有的知識與經驗；第三則是懂得運用前人的成就與經驗，創造新知識與新制度。這三點合併起來就是一種學術傳播。學術傳播原本是各學門學者專家將學科知識與概念傳佈出去，但為何一般人還需要有學術傳播的過程呢？因為學術傳播是社會進步的推手，學術研究是探求真理與創新知識。雖然學術傳播是發生在學術社群間的一種傳播行為，但承載學術傳播的成果與知識，就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媒介^{viii}。這種學術出版模式，早在 1960 年代的台灣社會裡萌芽，不過當年台灣出版產業主要是翻印西文和古文書為主。翻印西文書有其特殊的社會歷史脈絡，主要因為當時台灣的開發與建設，需要借重歐美新知，再加上台灣許多大學直接向海外取經，對外國專業學術書籍的需要量大，於是就產生大量的學術出版品，那時的學術出版業可為紅極一時^{ix}。

1980 年代是戰後台灣出版社本身第一波大規模的世代交替、改組、出走與另創新局；1990 年代，台灣出版社走上組織化、公司化、企業化、集團化；同時的台灣出版業可說呈現空前的多元化，任何主題都可以出版，政治的、本土的、性別議題、電腦等，而且每個領域都有獨領風騷的一群出版社，而由於暢銷排行榜等因素造成文學出版大眾化、通俗化，輕文學擠掉了純文學，暢銷作家出現，台灣出版業儼然已經分眾化。這時候，台灣出版產業雛型漸漸形成，產銷分離在大量出版社出現、連鎖書店、獨立書店與暢銷書排行榜的聲聲催促下，協助台灣出版產業走向真正的市場經濟。隨著市場經濟起飛、教育程度提高，民營出版社已經成為台灣出版產業的主軸與核心，大量關注消費者市場的台灣出版產業，間接造就學術市場的邊緣化。所以，本文特別提出這個被忽略的出版經濟調控政策，對台灣學術出版社生存而言，可能是保存台灣學術價值與知識重要的靈丹妙藥。雖然台灣本身圖書市場先天不足，若能透過政策力量，量身訂做經濟調控政策，或許可弭補學術出版的市場缺陷，讓學術知識得以傳承下去。其實，政府政策干預對經濟產業是一種動態的調整與過程，一方面當市場體制不

^{vii} 聯合報洪欣慈.學術如好酒大學出書需政府更多支持..[EB/OL] [2017-02-13].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2280834>

^{viii} 王梅玲.從學術出版的變遷探討學者、出版者與圖書館的角色[J].臺北：國家圖書館館刊,2003(1).P67-93.

^{ix} 王幹任.鳥瞰戰後台灣出版產業變遷：從出版社、經銷發行到書店通路的變化[J].臺北：國家圖書館館刊,2018(9),P50-57.



斷成熟，政府政策可退出這領域，但並不意味市場經濟的發展就會取消政府干預的要求。相反的，經濟發展總會不斷的提出新問題。對此，市場總有不能解決之時與範圍或經由政府的組織與協調而使市場調節與資源配置的效率更高，且越是發達的市場經濟越要求高效率的政府功能介入。政府的適當干預和介入是市場自由和市場經濟秩序的保證，但政府對市場的有限干預應在法律授權範圍內，即以法律形式來明確政府的職能並規範它的權責和行使途徑^x，這也正是本文提出透過政策經濟調控最重要的根本依據。

二、遺憾：過去出版研究

在台灣地區，出版一本新書，至少要賣 1,500 本才能回收成本，但學者寫的學術專書，通常賣不到這個量，學術期刊亦如是。學術專書每刷致多 300 到 500 本，一般學術期刊的印刷數量，更只是為了滿足各大公共圖書館與大學圖書館而已，別提會有多少營收可促進學術出版的發展。此外，學術專書與學術期刊，不僅內容無法面對大眾市場，銷量更無法養活出版社。台灣學術出版不僅市場無法支撐，台灣學術評量政策，也直接讓台灣學術出版陷入穀底。台灣學術升等辦法，從 2012 年以後，因開始過度重視國外 SCI 與 SSCI^{xi}期刊發表，以台大心理系黃光國教授等 2332 位學者連署的「反對獨尊 SSCI」，再度凸顯台灣學術專書的嚴重困境。許多年輕學者寧願被國外的 SSCI 所綁架，也不願意寫書出書。其中，政治大學教育系周祝瑛老師更表示，連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圖書館館員提到台灣學術專書數量的下降，導致美國史丹福大學圖書館想增加經費採購台灣學術專書時，都無書可買。更直接的是，台灣各大商業出版社對出版學者專書興趣逐年下降，進而也讓學者不再致力專業學術書籍的出版，進而導致台灣學術知識傳承面臨困境^{xii}。

台灣學術出版的實際業態，某些程度反映台灣大學出版社的功能不彰，才有民間的商業性質的學術出版社擔負起學術傳承與文化交流的重責大任。但，因為學術書的市場特性，目標讀者雖然明確但人數不多，獲利不易，加上若整個出版大環

^x 王騰坤、黃財源、初國華.經濟發展與政府角色：中國大陸案例與兩岸合作.[J].台灣：育達科大學報,2011(27).P163-180.

^{xi}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就是科學引文索引，由美國科學資訊研究所創建的，收錄文獻的作者、題目、源期刊、摘要、關鍵字，不僅可以從文獻引證的角度評估文章的學術價值，還可以迅速方便地組建研究課題的參考文獻網路。SCI 創刊於 1961 年。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即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亦由美國科學資訊研究所創建。這兩種是目前世界上用來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科學與社會科學期刊論文的數量進行統計分析的大型檢索工具。相對地，被 SCI 或者 SSCI 所認可的學術期刊，因 SCI 與 SSCI 有一定的搜錄規範，往往也較具價值，所以被許多地區的學術機構認定為學術品質好壞的重要指針。

^{xii} 陳佩瑜.論文重量不重質.新浪新聞中心. [EB/OL]. [2012-08-13].<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0813/7597462.html>



境的無法支持，例如：出版交叉補助(cross-subsides)的逐漸減少，這對學術專書是場的前途，值得堪慮。上述所提的學術升等辦法偏重國外期刊發表後，更直接讓學術界願意投入出版研究的主題也逐漸降低。從數量上不僅反映學者對研究出版興趣缺缺，就連願意開與「出版研究」相關課程的院校科系，也寥寥可數。

學術出版在台灣，不僅在市場上無法取得優勢，在學術研究上更無專業人士願意投入論述辯證，連最基本校園內的人才培育工作，也逐漸消失在各大院校科系之間。根據透過台灣博客來網路書店(www.books.com.tw)2018年10月份網上書目的出版社數量，以及台灣 ISBN 國際標準書號中心(www.isbn.ncl.com.tw)的交叉統計發現，台灣近五年來，平均每年出版1種書籍以上的私人出版社(包含個人)約有5,000家左右，而以出版學術專書為主的出版社，包含出版學者升等著作、專業書籍、學術論述、考試用書與期刊論文彙編等，以及國外學術翻譯書籍的出版社，約有120~130家，占台灣整體出版社數量2.6%左右。但，這比例並非準確描述台灣地區所有學術出版品概況，因為扣除上述2.6%，就整體台灣出版品總數而言，尚有每年平均超過8%^{xiii}以上的學術出版品屬於政府所屬出版機構，或者受政府經費補助的出版品。例如：台灣各公立大學出版中心、政府部門所屬研究機構(例如：林業試驗所、工業技術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政府委託計畫成果(例如：台灣地區「墾丁國家公園」生態研究)或者政府出資合作出版(例如：各縣市政府的出版品等)。

這些出版機構與出版品，反倒是台灣學術出版的大宗。暫且不論這些出版品對台灣地區民間學術傳播的影響程度大小與否，但就實際出版市場發展而言，已經讓台灣民間學術出版社站在一個不公平的起點；再加上目前台灣具有出版補貼機制的政府機構少之又少，僅有像台灣「科技部」、「教育部」與「國科會」等，反是來自民間公協會或者財團法人、基金會等，例如：財團法人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台灣地質學會或者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出資支持台灣學術傳播的比例反高於政府政策。這種現象，讓台灣學術出版社，顯得毫無競爭力。一個地區圖書出版產業的描述與統計，可透過宏觀視角與微觀描述來詮釋。其中，就宏觀角度來看，該地區的出版產業在整體經濟中所扮演的定位，以及地區政策對出版產業的認知與態度、作法(包括獎勵、稅賦與價格等政策)^{xiv}，對該地區圖書出版產業發展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xiii} 106年台灣圖書出版現況及其現況趨勢分析.[J].台灣：漢學研究中心,2018.

^{xiv} 彭建炎編著.出版學概論[M].大陸：吉林大學出版社,1991.



台灣學術出版沒落，似乎也與台灣出版專家學者研究重心與關注重點不在政府政策上有極大的相關。因學術研究成果以及學者們推動力，對許多產業發展與來說，都是直接的推力。所有的政策科學研究者都同意，知識是政策制定的基礎，當政策日趨複雜之際，政策研究者致力於政策研究，期能產生思慮周全的政策以及相關的政策知識，並廣為散佈與引用，解決各種政策問題，進而提高競爭力^{xv}。研究決策理論的學者們也一再強調，政策制定者對於搜集和分析知識所作的努力，直接關係到政策的品質，因為科研成果與知識對於政策制定具有一定規範性的影響力。翁興利^{xvi}指出，一個政策制定過程，就是一種知識的生產、傳散、到應用的過程，這些知識必須廣為散佈與引用才能解決問題。就政策制定者而言，如何透過研發單位或委託學術機構進行項目研究，將正確的資訊輸入掌控決策過程的機制，也是對決策過程運轉的理性提出評估。

因此，政策的決策是建立在一種科學的理性原則上，亦證明知識是政策制定的關鍵資源，有權力的決策者必須清楚政策的方法與內容。政策領域有六類的知識來源，包括：政治系統中的民意機構、政黨及利益團體、市場活動產生的訊息、相關行政部門回饋、司法系統、大眾傳播媒體意見，與相關的知識業（knowledge industry）：例如大學、政府研究機構、公民營研究機構、法人支持的研究中心。然而，這六項知識來源中只有第六種由相關知識業所生產的知識屬於科學知識。因此，社會科學研究者對政策制定者而言，扮演了主要的「知識生產者」（knowledge producer）的角色^{xvii}。

一個圖書出版市場之容量規模與市場潛力，因涉及到交易模式、定義類別、商業運作與稅額財務等，不管是政府、商業人士或者學者，都很難獲得準確得數位與市場實際動態；從學理來說，圖書出版市場的需求向來有其主客觀的條件，諸如圖書種類、定價、銷售通路等可被產業控制的主觀條件；以及社會、經濟、人文與政治等環境的客觀因素的影響。^{xviii}實際上，台灣許多出版研究重心，往往僅關注可被控制的主觀條件，忽略整體經濟與政策對產業影響；抑或者，過度關注資料呈現事實，例如：閱讀人口增加與出版市場產值升降，而真正可培養出版大環境的客觀因素，例如：政府政策，卻缺之弗如。換言之，思考如何讓台灣出版政策對學術出版發展產生助力，首先應關注過去台灣出版產業在學術研究上的論述有那些是不足的？這些研究成果為何無法促進或者幫助出版政策的制定？當然，

^{xv} 張世賢、陳恒均.公共政策：政府與市場的觀點[M].臺北：商鼎出版,1997.

^{xvi} 翁興利.知識應用與政策制定[M]臺北：商鼎出版,1996.

^{xvii} 單承剛、何明泉.設計政策制定中知識引用之研究[J].台灣：設計學報,2004(9-4).P77-92.

^{xviii} 邱炯友.台灣圖書出版統計資料：閱讀習慣與消費行為.[J].台灣：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2001(8).P39-52.



當這些知識生產者努力扮演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知識來源後，是否在進入政策制定過程黑盒子中，被其他因素所影響，就非本文所能臆測。

出版產業受數字科技影響甚巨，對學術出版來說更是深遠。早於 2000 年之前，國外大型出版集團中的勵德·愛思唯爾公司，就是以出版數位期刊著名^{xix}；而 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xx}旗下的 NetLibrary，更是世界知名電子書集成商(平臺)。現今無論大眾圖書或學術出版，影響產業發展的因素中，新科技已被視為重要變項，端不可再用傳統產業角度看待。目前台灣研究出版產業似乎鮮少有個人學者主動關注政策制定與政府態度，而部分研究成果仍屬於受政府委託計畫的研究範圍。台灣大學陳雪華教授、林維萱于 2008 年文章指出^{xxi}，歸納影響數字出版產業的四大構面分別是：一、技術、標準與版權管理機制；二、授權模式；三、內容；四、經營模式。另外，丁圓圓於 2016 年文章也指出^{xxii}，根據 2016 年 2 月台灣「國家圖書館」發佈《“滑世代”後的新書出版樣貌——2015 年台灣圖書出版現況及其趨勢分析》一文中提到，台灣圖書出版產業的數字轉型，目前已遇到三種困難，包括：一是市場之困，二是內容之困，三是政策之困。

透過文獻彙整綜述後，本文認為台灣的「知識產出者」們，應多關注缺了一角的「政策因素」對台灣出版的影響，見圖 1^{xxiii}。尤其是學術出版產業，學術傳播是各學門專家藉由傳播管道公告與傳送其創造的新知與觀念的過程，且經正式出版成為學術出版品，傳統是以圖書、期刊、會議論文集、研究報告與博碩士論文為主，近十年以來，大多數是採用電子期刊資料庫與電子書形式呈現。本文認為，學術出版傳播的保護，應該更高，甚至應被歸類於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就是指通過對政府資源的，協調經濟社會活動及相互關係的一系列政策的總稱。其中的「分配政策」，就是通過安排讓全體民眾都能享受使用政府的智力資源，以及透過「立法政策」，運用權力和資源改變整個出版環境^{xxiv}。這兩點正是本文強調為何要透過經濟調控的政策運用，達到對台灣學術出版的保障；更是本文希望透過台灣學者們的研究成果與發言監督，儘早促成政府政策制定的原因與目標。

^{xix} 愛思唯爾(Elsevier)是科技醫學出版商和分析服務提供者，創辦於 1880 年，屬於 RELX 集團旗下，總部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每年超過 35 萬篇論文發表在愛思唯爾公司出版的 2000 種期刊中。

^{xx} 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Inc.)即連線電腦圖書館中心，總部設在美國的俄亥俄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提供文獻資訊服務的機構之一，它是一個非贏利的組織，以推動更多的人檢索世界上的資訊、實現資源分享並減少使用資訊的費用為主要目的。

^{xxi} 陳雪華、林維萱.數位出版產業之構面研究.[J].台灣：圖書資訊學研究,2008(3).P1-26.

^{xxii} 丁圓圓.台灣圖書出版業的發展現況與轉型之困[J].大陸：出版參考,2016(10).

^{xxiii} 圖 1 由作者自行整理。

^{xxiv} 何盛明.財經大辭典[M].大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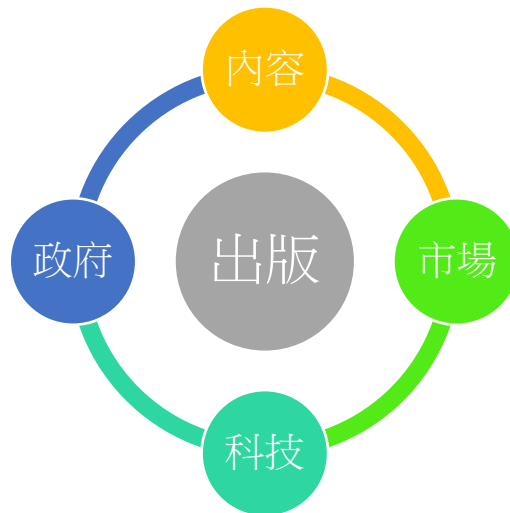


圖 1：影響台灣出版產業四大變項

三、方法：從資料分析到交叉補助

從圖書需求與圖書價格而言，專業學術類書種的市場需求彈性小，加上產品特殊與知識內容門檻較高，導致該類圖書價格彈性低，市場競爭力小。但，專業學術類圖書的外部性極高，出版該類圖書對整體社會與民眾而言，容易產生更多書本本身價值外的效益，例如：透過紙本的知識傳播減少知識貧富差距等。所以，當市場機能無法解決時，該如何透過政策幹預對產業有正向影響，是相當重要的。例如：美國透過政府與民營基金會，大量對學術著作進行經費補貼；英國則是在每年財政預算中，對於非營利機構與學術出版品編列經費補貼。而這些都是政府政策幹預市場的正面案例。^{xxv}

英國出版商協會在 2016 年 5 月公佈的英國圖書銷售統計數字，英國電子圖書銷量同比 2015 年萎縮 1.6%；而 2015 年英國圖書銷售總量中，電子書也只占 17%。相反，紙質書銷量持續增加，獨立書店的關停率也在下降。雖在先前受到網路書店和電子書衝擊，英國最大連鎖書店「水石書店」曾在 2011 年瀕臨破產，但通過一系列改革措施，近兩年已扭虧為盈。而造成英國大眾圖書銷量轉虧為盈的關鍵，在於英國對出版大資料的捕捉和分析，透過精準行銷與控制成本，是英國紙本圖書產業銷量不降反升的重要因素。而出版大資料也逐漸成為一個重要領域，英國更可說是全球出版資料最完備的國家之一^{xxvi}。

^{xxv} 同註 5.

^{xxvi} 保羅·理察森. 十年來，歐洲出版發生了哪些改變？[EB/OL] [2017-05-18].



Christine L. Borgman (1990) 將學術傳播定義為：「系所有學門領域的學者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管道來使用與傳播資訊的過程。」^{xxvii}學術出版乃是學術傳播理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學術研究一旦完成後卻不出版或公諸於是進行資訊交流與知識轉移，就如同將石頭丟進池塘裡，永遠只是浸泡在死水之中，無法與外界連結並且做出貢獻與獲得回報^{xxviii}。學術出版雖然只是學術傳播系統中的一種傳播管道而已，但對學術傳播系統的運作卻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主要的原因在於學術出版是學術傳播系統中的具體產物。^{xxix}目前台灣的學術出版單位略分四種，分別是屬於大學行政部門附屬的出版組織，如：台灣大學出版中心、民間出版社，如：群學出版社、致知學術出版社與花木蘭文化出版社等、政府相關單位，以及公立研究單位的成果專業型圖書四種等。

但是，學術出版市場本質在於小眾，面對特定的讀者群，基於學術出版不以商業利潤為考慮之精神，乃以學術傳播出版之價值為首要目的，故不宜與一般商業出版社共同競爭廣大讀者為最終目標。所以，出版大資料分析與精準行銷，對學術專書而言，似乎可有可無。但這種精神本質對台灣的學術出版社而言，似乎連依靠行政機構的大學出版社也叫苦連天。若以台灣大學出版社為例，雖然台大出版中心是類似美國全額預算單位的運作模式，附屬大學院校之內的機構，但經費大量依賴學校預算的支出，加上台灣社會捐款風氣和歐美不同，鮮少有基金會捐款與補助，導致連台大出版中心都常常面臨資金窘困的狀況^{xxx}。同理可證，占台灣學術出版市場將近 3/4 的政府機構出版品都無法獨自依賴市場營運，遑論民間出版社如何憑藉市場機制存活呢？

政府介入企業經營的模式，以補貼政策最為常見，其中補貼可分為涉及經營權的股權持有，以及單純的生產補貼兩種。而補貼政策往往是政府經濟調控的最直接方式。經濟調控，是指政府運用經濟手段，採用政策辦法對經濟產業運行進行的調節控制，相關的政策手段包括：價格、工資、信貸、稅收等以價值形式表現的控制方式和經濟杠杆^{xxxi}。不過，這些政策手段的執行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通常是好話兼具，某些角色感受到的獲益，也可能是另一角色的損失；因此，在政策施行前，目標的確立和審慎的評估有其必要。「目前圖書出版產業是否健全？政策介入是否必要？政策介入希望達成的文化目標是什麼？政策是唯一或者仍有

<http://www.cptoday.cn/news/detail/3432>

^{xxvii} Borgman, C. L. (Ed.).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bibliometrics*. [M] Newbury Park: Sage, 1990.

^{xxviii} 黃思慈、李家瑋. 數字時代的大學出版價值鏈與未來發展[J]. 台灣：中華印刷科技年報, 2012. P324-336.

^{xxix} 蔡明月. 學術傳播與書目計量學.[J] 台灣：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1999(35-1). P38-57

^{xxx} 廖靜華. 台大出版中心營運策略之探討[D]. 台灣.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論文, 2008.

^{xxxi} 黃漢江. 投資大辭典[M]. 大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0.



其他手段可達到預想目標？不同手段的成本效益又是如何？」等等，都是制定政策前需要思考評估的。書籍市場本身就有難以預測成功商品的特性，因此歐美各國再針對經濟調控時，會多方考慮市場反應。舉出版產業裡的交叉補貼(cross-subsides)與固定價格制定來說，暢銷書相較於冷門書，一般具有較高的價格彈性，因此政府推動經濟調控後，暢銷書收益相對減少，冷門書或者學術書較不受影響或相對增加。^{xxxii}

在台灣，因為對學術出版補助經費的機構太少、政策多僅止於評估卻沒落實，例如：稅收減免、資金貸款或固定價格制等；此外，台灣學術出版(包括專業圖書與學術期刊)，並無專責行業公會或協會，僅依靠一般圖書出版產業，加上台灣出版行業公會或協會，沒有實際行政權力與規範功能，僅能依靠會員們的自覺。這種情形相較於國外圖書產業發達地區，台灣出版產業的政府政策，似乎形同一紙具文，無太多實質意義。換言之，台灣地區圖書出版產業，既無政府政策支持，更無有實際權力的行業公協會輔助，而台灣圖書出版產業的沒落，似乎早成定局。商業發展，不應只是完全是放任市場自由發展，對於那些具有公共性的產業，例如：圖書出版產業中的學術出版，它本身的存在與傳播，對社會發展與知識水準的提升有極大貢獻，就必須納入政策保護。文化的產生與積累，更是來自圖書出版傳播的支撐，更不可放任其受市場自由原則恣意發展。

根據歐美國家發展經驗，經濟調控往往包括出版的交叉補助、稅收優惠、信用貸款與圖書固定價格制度等。高品質的文化典籍需要外部資金、擴大國民閱讀需要政府投入、加強出口需要被鼓勵，這些正指出從圖書生產到流通的各個環節，都必須透過政府投入資金先行鋪平道路。以美國為例，為保護文化多樣性，美國政府資助與補貼多以學術著作的出版為主，但仍包括商業出版機構。此外，稅收的優惠與減免，也是歐美各國出版產業的重要經濟手段，例如：美國對於非營利出版社不徵稅，反而給補助；英國政府為鼓勵學術出版，對非營利出版社給於免增值稅、營業稅與所得稅等。法國政府因實施統一書價制度，對出版產業不徵稅；而日本政府的稅收，會針對出版社當年的退貨率與庫存數量造成的損失進行考慮徵稅稅額問題^{xxxiii}。

此外，法國政府因考慮小型出版社與書店的經費不足，成立特殊擔保基金，以確定出版社可以獲的銀行的貸款；加拿大則是成立圖書出版商貸款計畫，提供資金貸款；而日本更是有效利用金融手段促進中小企業出版社培育與發展的，讓低利

^{xxxii} 邱炯友等.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M].臺北：文化部.2016,P13-34.

^{xxxiii} 同注3.



資金引導出版社發展。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些相當成熟的經濟調控政策，其實已經在許多地區與國家，都早被證實有其功能與效果。一般圖書產業，可以利用新科技與大資料分析，找到真正讀者，節省成本、控制庫存與精準行銷；而學術出版，這種以傳播知識為目的，用文字或者符號紀錄於一定形式的材料上的著作物，的確有別於普通商品的特殊商品；這是一種特殊的精神消費品，具有公共產品特性，更應該納入政府的公共政策，擴大與持續經濟補貼，讓台灣學術出版有機會不僅保存、傳承，更能走向國際、發揚光大。

四、結語：邁向全球的華人學術

近年來，各地區的學術評量日益受到重視，而台灣的學術領域卻苦於缺少適當專書出版管道、專書寫作不受重視等問題而頗受困擾；加上圖書館界近年來雖然對於電子書、電子出版等議題有所接觸，但卻鮮少將專書出版問題放置在學術傳播的需求和架構下來探索。影響台灣學術出版的日趨沒落總結有幾點：1.學術環境的因素，其中評鑒與升等的壓力，讓台灣學術專書不受重視^{xxxiv}。2.專書市場環境變化，圖書館的預算危機與專書銷售惡行迴圈是造成市場萎靡重要因數。學術圖書一直是學術專書最主要市場，但因電子資料庫排擠了專書預算、科學期刊價格上、經濟不景氣及政府削減對大學的補助等等，都可能是圖書館專書購買力下降的原因。^{xxxv}此外，學術專書銷售量日漸下滑，造成出版商不得不縮短專書發行週期與提高專書的價格，才能支應專書的出版成本。如此一來，能購買的讀者就會更少，而作者就會更難找到出版商出版，造成專書出版的惡性循環。3.讀者閱讀專書行為的變化，專書文字書寫無法吸引人，導致專書的銷售不佳，也不能激起讀者的興趣；加上許多學生因為數字科技的進步，也逐進不買學術性的專書，使得專書銷售無法有突破性的成長。4.專書出版條件劣化：民間學術出版社與大學出版社經營不易，市場上獲利以維持營運、保持新書的出版機會，導致學術出版社為了生存，開始出版一些大眾讀物，例如：旅遊書或者食譜，使得內容嚴肅的專書少了很多出版機會。加上政府部門政策改變、補助經費刪減、或者固定成本下降，讓學術專書出版雪上加霜。

其實，學術專書出版困境，許多學者專家，乃至於台灣地區相關單位已紛紛

^{xxxiv} 吳紹群、陳雪華.人文學專書出版對學術傳播之影響.[J].台灣：大學圖書館,2011(15).P39-61

^{xxxv} Dalton, M. S.. A system destabilized: Scholarly books today.[J].Canada :Journal of Scholarly Publishing,2006(37-4).P251-269.



提出各種解決或補助方案，這些方案其中主要包括應用科技進行電子出版與電子商務販賣，或者提供專書出版補助等^{xxxvi}。但，政府政策的扶植與補助的最終目標，就是希望把產業導向正軌，讓市場機制養活產業的發展。台灣學術出版品短期目標在於透過政府政策落實經濟調控，讓已經陷入危局的台灣學術傳播，有機會在政府介入情形下，回歸正軌；而長期目標，更是希望透過在閱讀環境塑造，讓台灣閱讀人口回流之外，如何把優質的台灣學術市場的擴大與推廣，或許才是在政策之外的最重要目標。

本文雖強調政策對產業發展重要性，但更期待回歸市場機制。因學術出版品具有公共性，不僅是學術出版品本身負載著知識與文化傳播功能，更因學術出版品比一般大眾讀物擁有更大的外部性。外部性，就是溢出效果，或外部影響，指的是當某位元讀者或某組織機構主動購買學術出版品，這種經濟活動對他人和社會造成的非市場化的影響^{xxxvii}，而這種影響正是涵蓋且擴大知識與文化積累的效果，進而間接促進形成一種富而好禮的社會氛圍。所以，如何兼顧政策補助，讓學術出版品短期可以生存，以及透過市場發展，在長期而論，創造台灣學術出版的價值，這種共贏的環境與機制，似乎才是對台灣學術出版社較具意義的

全球化與國際化的概念是不同的。國際化是指國際領域之間的關係強化，而全球化則是社會關係獲得無邊界、無距離的發展過程。在全球化過程中，還包括了「文化全球化」的概念在裡面。^{xxxviii}上述提到台灣學術出版的長期目標在於擴大市場，而學術市場，不應該區分兩岸。這裡所提包括除了讓台灣學術出版進入大陸市場更加簡便容易之外，如何攜手兩岸邁向國際，似乎是更重要的出口。兩岸發展自 1980 年代晚期以來，經貿與產業的互動，應視作經濟全球化的影響與結果，而對兩岸出版產業而言，兩岸的學術出版，更是互補互利的。因為，出版產業是一個民族文化的象徵，有了出版才衍生了後來許多的文化產業。經濟調控或者兩岸合作，並不是圖利出版產業，而是提升閱讀力，建立民族自信。但是，若只是一味透過引進外來版權，或只出版適合大眾消費文化的一般圖書，這無助於中華文化的知識傳佈與文化積累。劣幣逐良幣，消費文化打敗了真正知識文化，這樣的結果，似乎無助於兩岸共同邁向全球化。

^{xxxvi} 魏念怡.國科會補助出版人文學與社會科學專書及論文集作業要點修正及實施[J].台灣：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003 (4).P43-46.

^{xxxvii} 徐桂華、楊定華.外部性的理論演變與發展[J].大陸：社會科學,2004(3).P26-30

^{xxxviii} 孫智娟.台灣在全球化趨勢下的競爭策略[J].台灣：台灣文官培訓所 T&D 飛訊,2009(80).

